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机制研究

刘舒雅, 支永碧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31日

摘要

生态翻译学作为国内原创性翻译理论体系, 依托生态学隐喻重新阐释了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 将翻译行为界定为译者在整体翻译生态环境中持续开展适应性调试与选择性转换的动态过程, 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长期固化的文本中心研究范式, 推动翻译研究的重心回归翻译活动的主体层面。现有学界成果多依托三维转换理论开展译本个案对比分析, 侧重应用性文本阐释, 对于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背后的内在运行逻辑、阶段特征以及互动关系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梳理, 相关理论思辨层面的研究仍存在补充空间, 同时该理论自身的隐喻类比、译者中心论等核心命题也持续引发学界商榷与讨论。本文依托生态翻译学核心原著理论体系, 兼顾黄忠廉、王剑、王宁等学者对该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以翻译生态环境的多层结构为研究切入点, 逐层阐释译者在翻译全过程中的行为演进特征, 梳理适应行为与选择行为之间的依存关系与运作规律, 并结合经典中英文学译本的真实翻译语料, 具象呈现译者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与交际维度中的调适策略与取舍逻辑, 据此分析翻译实践中常见的译文失衡问题成因, 进一步探讨优化译者主体翻译行为、实现译本生态平衡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 翻译活动的完整推进过程始终围绕译者的主体行为展开, 前期的生态适应为后续译文产出提供判断依据, 多维选择性转换是适应成果的具体文本呈现, 译后阶段的自我修正与外部筛选则完成翻译生态的最终平衡, 三者构成循环联动的有机整体。本研究旨在深化对译者主体行为机制的理论认知, 同时客观辨析生态翻译学理论局限, 为各类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理论参照与思路启发。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译者主体, 适应与选择, 翻译生态, 三维转换

On the Translator'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Shuya Liu, Yongbi Zh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Abstract

As an original domestic theoretical syste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co-translatology reinterprets the essential rules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ecological metaphors. It defines translation as a dynamic process in which translators continuously carry out adaptive adjustment and selective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overall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It broadens the long-established text-centered research paradigm 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to a certain extent, shifting the focus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back to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Most exist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focus on case analysis of translated texts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emphasize applied textual interpretation, while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orting out of the internal operational logic,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hind translator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behaviors is insufficient, leaving room for supplementation in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Meanwhile, core propositions of this theory including metaphorical analogy and translator-centrism have continuously triggered academic discussions and critiques. Based on the cor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co-translatology, this paper takes critical reflections from Huang Zhonglian, Wang Jian, Wang Ning and other scholars into consideration, takes the multi-layered structure of the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explains the behavi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ors in the whol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sorts out the dependency and operational rules between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behaviors. With authentic bilingual translation materials of classic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ry translations, this paper concretely presents translators' adjustment strategies and trade-off logic in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common translational imbalance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further explores feasible ways to optimiz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translation behaviors and realize ecological balance of translated tex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revolves around translators' subjective behaviors. The early ecological adaptation provides judgment basis for subsequent translation output, multi-dimensional selective transformation is the specific textual presentation of adaptation results, and self-correction and external screening in the post-translation stage complete the final balance of translation ecology, forming an organic whole of circular linkage. This study aims to deepen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e behaviors, objectively distinguish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multi-type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ranslation Ecology,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二十一世纪初, 翻译研究完成标志性的文化转向之后, 跨学科融合逐渐成为译学研究的主流发展趋势, 单一依托语言学体系开展文本对比的研究模式已经难以完整阐释复杂的跨语言、跨文化翻译活动。在这一学术背景下, 国内学者胡庚申依托生态学的研究视角与核心逻辑, 结合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 构

建起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生态翻译学理论框架[1][2], 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与选择原理引入翻译研究领域, 形成了区别于西方功能翻译理论、操纵理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原创译学体系。生态翻译学的核心学术主张重新界定了翻译活动的本质, 将翻译阐释为译者不断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依据生态需求完成文本选择与转换的系统性行为, 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传统研究中原文中心论与译文中心论的二元对立思维, 明确了译者在整体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但“译者中心”的单一视角也遭到部分学者质疑, 被指出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难以兼顾文本、读者、赞助人等多元翻译群落的制衡关系[3]。

纵观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于各类语言学与翻译研究期刊的文献大多聚焦具体文本的三维转换应用分析, 研究对象涵盖文学典籍、外宣文本、影视字幕、民俗文化文本等多种类型, 通过译本对比验证三维转换理论的实践价值[4][5]。整体而言, 现有研究偏向实践应用层面的案例阐释, 针对译者适应与选择核心机制的理论性、系统性梳理相对薄弱, 多数研究在论述过程中模糊了适应行为与选择行为的时序逻辑与内在关联, 将二者混同作为文本分析的工具, 忽略了整套行为机制循序渐进、循环递进的完整运行过程。部分研究对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理解局限于狭义文本语境, 未能兼顾语言、文化、社会交际多层生态要素的联动影响, 导致相关理论分析存在片面化、表层化的问题; 同时, 多数应用类文献对生态翻译学自身的理论短板缺乏对话式反思, 较少回应学界针对其类比逻辑客观性、理论边界模糊等层面的批判观点[6][7]。

基于现有研究存在的短板与空白, 本文立足于生态翻译学经典原著的权威理论界定[8][9], 同时吸纳黄忠廉、王剑等学者的批判性研究成果[6][7], 严格依托已有成熟学术成果开展理论梳理与思辨分析, 不做主观杜撰与无依据推演。在厘清翻译生态环境多层结构与译者中心理论内涵、客观呈现学界正反两方面观点的基础上, 循序渐进拆解翻译全流程中译者的行为演进规律, 结合权威经典译本的真实语料完成具象化分析[10][11], 探讨翻译实践中译本失衡问题的内在成因, 总结适配翻译生态的优化路径, 以期进一步细化生态翻译学的主体行为研究体系, 为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工作提供兼具理论阐释与反思批判价值的参考。

2. 生态翻译学核心理论内涵阐释

2.1. 翻译生态环境的多层结构特征

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基础概念, 也是译者所有适应与选择行为的客观前提, 区别于传统翻译研究中狭义的文本语境概念, 是由源语言系统、目标语言系统、文本内容、文化体系、社会交际场景、读者认知特征以及翻译传播需求等多重要素共同构成的整体性生态系统, 所有要素相互交织、相互制约, 共同形成翻译活动赖以发生的整体环境[1]。王剑指出, 该概念依托自然生态隐喻构建, 具备较强的文本阐释力, 但隐喻类比天然存在局限, 难以完全覆盖翻译活动中权力、意识形态等非生态类约束要素, 存在理想化预设的缺陷[7]。

从生态层级的内在结构来看, 翻译生态呈现出由微观到宏观的递进特征, 不同层级的生态要素对译者的翻译行为形成不同维度的约束与引导。文本语言层面的微观生态构成翻译活动的基础载体, 涵盖文本整体文体风格、句式组织结构、词汇选用特征、修辞表达习惯等具体语言要素, 决定了翻译转换的基础形式规范。根植于语言体系之下的文化生态属于翻译活动的中层结构, 包含源语族群与译入语族群的价值理念、民俗传统、历史文化意象、特色文化符号与思维方式, 是跨语言转换中最易产生信息偏差与文化隔阂的核心环节。

超越文本与文化本身的社会交际生态构成翻译生态的宏观顶层结构, 囊括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翻译传播目的、受众阅读期待、市场传播导向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需求, 决定了翻译文本的整体交际功能与传播价值。多层生态结构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相互嵌套、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 译者开展的所有翻译

调适行为与文本选择行为, 都需要同时适配多层生态的整体要求, 单一维度的适配调整难以实现译本的整体生态平衡。

2.2. 译者中心理论的核心要义

在传统翻译研究的漫长发展历程中, 学界长期围绕原文忠实与读者适配展开二元讨论, 原文中心论强调译文需要贴合原文文本形式与语义内容, 弱化译者的主观调整空间, 读者中心论则侧重译文的可读性与传播效果, 容易造成源文本语义与文化内涵的流失。两种研究范式均将译者视作文本转换的被动工具, 忽视了译者在跨语言、跨文化转换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无法完整解释不同译者针对同一文本产出差异化译本的核心原因。

生态翻译学提出的译者中心理论重构了翻译研究的主体视角, 明确译者是衔接源翻译生态与译入翻译生态的唯一能动主体, 整套翻译活动的推进、调适与优化均依托译者的主观行为完成[12]。译者自身的双语语言储备、跨文化认知水平、翻译理念认知、审美偏好与翻译经验, 共同构成译者的内在生态系统, 内在生态的综合水平直接决定译者对外部翻译生态环境的感知能力、适应水平与选择边界。但该理论自提出以来持续存在争议, 陈水平提出, 过度抬高译者核心地位容易陷入狭隘人类中心主义, 弱化原文、读者、赞助人等多元主体的制衡作用, 与生态整体主义的内在逻辑存在内在矛盾[3]; 黄瑞、王园则撰文回应, 认为“译者中心”特指翻译操作层面的行为主体, 并未否定其他生态要素的约束效力, 批判观点存在概念误读的问题[13], 二者形成持续的学术对话空间。

翻译活动的本质, 是译者依托自身内在生态条件, 主动适配外部多层翻译生态环境, 在多重约束条件中权衡取舍、筛选最优文本表达的动态过程。译者的主体行为贯穿翻译前期准备、文本转换产出、译后修改优化的全部流程, 是决定译本质量、平衡语义传递、文化输出与交际效果的核心关键, 这一理论界定也为后续阐释译者适应与选择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 而学界围绕该理论的正反辩论, 也为本文辩证分析译者行为机制提供了思辨基础[3] [7]。

3. 译者适应与选择的阶段性运行机制

翻译视域下的适应行为与选择行为并非同步有序开展, 而是遵循循序渐进、前后依托的时序逻辑, 形成完整闭环的运行体系。适应是选择发生的前置基础, 选择是适应成果的落地呈现, 整套行为体系伴随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持续动态调整, 最终实现译本与整体翻译生态的适配平衡。

在正式开展文本翻译之前, 译者会率先完成对整体翻译生态环境的全方位感知与适应性调适, 这一前置阶段的隐性行为是后续所有文本产出的重要前提。译者会依托自身的语言与文化储备, 深度感知源文本的语言风格特征, 贴合原文的文体调性、句式节奏与用词习惯调整自身的翻译表达逻辑, 避免译文出现语言风格的违和与割裂。同时译者会主动梳理源文本中蕴含的特色文化符号、民俗意象与价值内涵, 对照译入语受众的文化认知体系, 预判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认知偏差与理解壁垒, 提前建立文化转换的适配思路。

针对宏观交际生态的适配调适同样不可或缺, 译者需要结合文本的翻译传播目的、目标受众群体与整体传播场景, 确立本次翻译活动的核心价值导向, 明确文本翻译是侧重学术严谨性、文化传播性还是大众可读性, 以此划定后续文本选择与表达取舍的整体标准。前期的生态适应属于译者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调试过程, 不直接产生文本成果, 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后续译文选择的合理性与适配度, 前期生态认知越全面、调适越充分, 后续的文本转换行为就越贴合整体翻译生态的需求。王剑指出, 现实翻译场景中大量译者会受限时、委托方要求、自身语言短板限制, 难以完成全方位生态适应, 现有理论对理想化适应场景的预设, 与真实翻译实践存在脱节现象, 这也是译本失衡问题频发的底层诱因之一。

完成前置生态适应之后, 译者正式进入文本产出的核心阶段, 依托前期建立的生态认知, 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核心维度开展持续性的选择性转换与动态取舍, 三个维度的文本调整同步推进、相互制衡, 共同完成源文本到译入文本的生态转化。语言维度的选择调整聚焦双语语言规范的适配转换, 译者结合英汉双语的句式差异、词汇体系与修辞习惯, 对原文的语言形式进行合理重构, 在保留核心语义的基础上适配目标语言的表达逻辑。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传统中式短句叙事文本时, 充分适配英语句法完整严谨的语言特征, 对原文流水句进行逻辑整合与句式补全, 在不改变原文温情雅致叙事基调的前提下, 贴合英语读者的语言阅读习惯, 实现语言生态的适配平衡[11]。这类文本取舍并非简单的句式改写, 而是译者基于双语语言生态差异做出的主动性选择, 是前期语言生态适应的具体文本落地。

文化维度的选择性转换重点解决跨文化信息传递的隔阂问题, 译者在源文化保留与译入文化适配之间寻找平衡支点, 依据整体传播需求合理调整文化符号的呈现方式, 既避免过度直译造成的文化晦涩难懂, 也杜绝过度归化导致的本土文化内涵流失。葛浩文在翻译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小说时, 针对藏族特色宗教文化词汇, 摒弃极端直译加注与完全替换的单一翻译模式, 选用英语语境中适配度最高、语义最贴合的通用文化词汇完成转译, 在保证异域文化特征基本留存的同时, 最大程度降低西方普通读者的认知障碍, 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10]。这类翻译取舍依托于译者前期对双向文化生态的全面认知, 是文化维度生态适应成果的直接体现。

交际维度的转换以整体交际意图的有效传递为核心准则, 当语言形式适配、文化信息保留与文本交际效果产生冲突时, 译者通常以保障交际功能优先为核心原则开展文本调整。不同译者针对同类文本产生的翻译差异, 大多源于交际生态认知的区别, 面向学术研究受众的翻译活动更侧重语义完整与文化严谨, 面向大众普及受众的翻译活动则更侧重文本流畅与易懂性, 交际生态的差异化适配直接决定译者的文本选择倾向, 最终形成风格迥异的译本表达效果。

在文本初稿完成之后, 整套适应与选择机制进入收尾优化阶段, 形成译后生态筛选与自我修正的闭环环节。译者依托对整体翻译生态的完整认知, 对初稿文本进行全方位复盘优化, 筛选并剔除语言生硬、文化错位、交际失效的文本表达, 对适配度不足的句式与词汇进行二次调适与修改, 通过多轮自我筛选实现译本的初步生态平衡。除译者自我修正之外, 译本最终还要接受外部翻译生态的检验与筛选, 贴合时代传播需求、适配受众认知体系、平衡多维生态要素的译本能够完成长期传播, 而生态适配度较低、存在明显维度失衡的译本则会被市场与学界逐步淘汰, 外部生态的筛选进一步完善了整套适应与选择机制的运行闭环。

4. 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失衡成因及优化路径

在真实翻译实践过程中, 译文出现语句生硬、文化失真、语义偏差、交际弱化等常见问题, 本质上均是译者适应与选择整套运行机制出现局部失衡导致的结果, 结合生态翻译学的多层生态结构与行为运行逻辑, 同时参考黄忠廉、王世超对该理论边界的辨析成果, 可以清晰梳理机制失衡的内在根源, 并形成针对性的优化调整思路。

部分译本出现维度单一适配、整体观感割裂的问题, 根源在于译者前置生态适应存在认知局限, 未能完整把握多层翻译生态的整体特征, 仅聚焦源文本语言形式的表层适配, 忽略了文化生态差异与宏观交际生态需求对译文的约束作用。译者在翻译准备阶段缺少对传播场景、受众认知特征与文化差异的系统性研判, 仅以原文语义忠实作为唯一翻译标准, 使得后续的文本选择行为缺少完整的生态依据, 最终产出的译文虽然能够实现语言语义的基本准确, 却极易出现文化晦涩、传播性弱、交际意图弱化等问题, 难以适配整体翻译生态的综合要求[6]。黄忠廉、王世超提出, 生态翻译学的解释力存在明确理论边界, 对于时政外宣、机器翻译等强外部约束文本, 单纯依靠译者自主适应与选择难以覆盖全部翻译制约条件,

不能将其作为普适性翻译评判标准[6]。

多维选择权重失调是译本失衡的另一重要诱因,部分译者在文本转换过程中过度侧重单一维度的适配效果,忽视三维维度的协同平衡关系,导致译本生态结构残缺。过于追求语言形式的忠实,容易造成译文句式僵硬、不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过度侧重文化异化输出,会造成文本阅读晦涩、交际效率下降,而一味迎合译入读者阅读习惯开展过度归化改写,则会造成源文本文化内核与独特审美价值的流失。三维维度的权重失衡打破了多层翻译生态的平衡状态,使得译本无法兼顾语言规范、文化传播与交际功能的多重需求,最终导致译本质量存在明显短板。

译者自身内在生态的储备短板,是限制适应与选择质量的根本主观因素。翻译的多维适配与动态取舍,对译者的双语功底、跨文化认知、理论素养与审美能力均提出较高要求,译者内在知识体系存在短板,会直接导致对外部翻译生态的感知不全面、调适不充分、选择空间受限,即便具备完整的理论认知,也难以产出多维平衡的优质译本。

针对上述失衡问题,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需要建立全流程、多维度的生态适配思维,同时客观认知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局限,不将三维转换作为唯一翻译评判标尺,从翻译准备阶段完善生态认知,在正式翻译阶段坚持三维协同平衡的转换原则,在译后阶段强化自我修正与多维校验,逐步优化自身的翻译行为体系。翻译前期需要全面梳理文本所属的语言特征、双向文化差异与整体交际传播需求,构建完整的翻译生态认知体系,为后续文本选择建立清晰的评判标准。文本转换过程中始终兼顾语言通顺规范、文化信息保真与交际意图传递的多重目标,根据文本类型合理微调三维维度的适配权重,避免单一维度的极端化取舍。译者需要长期积累双语语言与跨文化知识,持续完善自身内在生态体系,提升对翻译生态差异的感知与调适能力,同时重视译后复盘优化工作,通过多轮多维校验剔除译本的生态适配漏洞,最大程度实现译本与整体翻译生态的动态平衡。

5.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结合现有生态翻译学研究成果与本文的理论梳理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国内学界针对译者适应与选择机制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同时现有研究普遍存在批判性对话不足的短板,多数文献仅单向应用理论,缺少与学界质疑观点的双向思辨。现有多数研究的核心重心集中在各类文本的三维转换应用分析,以具体译本的对比论证为主,侧重实践现象的阐释说明,针对适应与选择行为内在逻辑、时序关系与运行机理的纯理论思辨研究数量相对有限,对整套机制的阶段特征、联动规律与失衡逻辑的系统性拆解仍不够充分。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多聚焦传统经典文学典籍的翻译生态,针对新媒体语境、人机协同翻译模式、新时代外宣通俗文本等新兴翻译生态场景下译者行为机制的研究相对匮乏,难以适配当下翻译业态的全新发展特征[4][5]。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成果以文本静态对比的定性分析为主,依托翻译过程追踪、译者质性访谈的实证研究较少,对译者真实翻译行为动态过程的还原度有待提升。此外,多数应用类研究回避生态翻译学自身争议,未针对隐喻类比缺陷、译者中心论的片面性等问题展开反思,理论对话深度不足[3][7]。

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未来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译者主体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适应与选择机制的内在运行细则,结合不同文本类型的生态特征,探究不同场景下三维转换的权重配比规律,完善译者主体行为的理论研究体系;同时主动吸纳王剑、陈水平等学者的批判观点,开展理论内部的自我反思,厘清生态翻译学的适用边界,减少理论泛化使用的问题。实践层面可以结合人工智能辅助翻译的全新生态场景,探究人机协同模式下人工译者的生态适应新要求与文本选择新策略,分析机器翻译的生态缺陷与人工补偿路径,进一步拓宽生态翻译学的应用边界。同时可以引入质性实证研究方法,动态追踪译者翻译全过程的行为变化,更加真实、立体地还原译者适应与选择的动态运作过程,推动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

在辩论与反思中持续完善与创新发展。

6. 结语

生态翻译学以生态学的全新视角重构了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的文本中心范式,凸显了译者主体在翻译生态系统中的能动地位,为阐释翻译行为、评析译本质量、优化翻译实践提供了一套具备本土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但该理论依托自然生态隐喻构建,天然存在理想化预设、理论边界模糊、译者视角单一等局限,学界至今仍存在持续商榷与批判,开展相关研究需要保持辩证审视的态度,不可全盘肯定或机械套用[3][7]。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行为构成翻译活动的完整运行主线,前置阶段的全方位生态适应是文本合理转换的根本前提,翻译过程中的三维选择性转换是生态适配的核心落地形式,译后阶段的自我修正与外部生态汰选实现译本的最终平衡,三个阶段循环联动、层层依托,共同构成完整闭环的翻译运行机制[2][12]。

翻译实践中出现的各类译本失衡问题,本质上是译者生态认知不全面、三维适配不均衡、主体能力不充足引发的机制运行偏差。译者只有建立整体性、多层次的翻译生态思维,完整适配语言、文化、交际多层生态需求,在多维制衡中合理取舍、动态平衡,同时客观认知生态翻译学的适用局限,结合其他翻译理论互补参照,才能产出适配传播场景、兼顾文化价值与交际价值的优质译本。

作为我国本土原创的翻译理论体系,生态翻译学仍处于持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对译者适应与选择主体机制的深度探究,同时兼顾对理论本身的批判性反思,不仅能够进一步丰富翻译主体研究的理论内涵,也能够为各类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对推动中国文化外译、提升跨文化传播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2] 胡庚申. 适应与选择: 翻译过程新解[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24(4): 90-95.
- [3] 陈水平. 生态翻译学的悖论——兼与胡庚申教授商榷[J]. 中国翻译, 2014, 35(2): 68-73.
- [4] 刘梦. 国内生态翻译学(2008-2024)研究综述[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5): 162-170.
- [5] 李鑫蕾.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英译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6): 162-170.
- [6] 黄忠廉, 王世超. 生态翻译学二十载: 乐见成长 期待新高[J]. 外语教学, 2021, 42(6): 12-16.
- [7] 王剑. 生态翻译学在“纯理”导向性研究维度的问题剖析[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 44(4): 85-93.
- [8]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 32(2): 5-9, 95.
- [9]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译道与译术[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5.
- [10] 朱振武. 从单一走向多维的忠实理念——以葛浩文对萧红作品的改译为中心[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2(3): 71-77.
- [11] 朱美芳.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林语堂《浮生六记》的译本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10): 105-110.
- [1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与国际发展[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51(1): 174-186.
- [13] 黄瑞, 王园. 澄清与辨析: 关于生态翻译学的中观研究[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46(4): 108-118.